

# 马克思与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 差异及其对我国改革的启示

□周小亮

改革实质上是制度变迁的过程。因此迫切需要科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作指导。列宁讲过,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实践。前几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在西方“大行其道”,而且在中国也非常走红,甚至有以它来指导改革的倾向。这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改革,是很不相称的。本文以马克思与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为视角,分析其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得出几点改革启示。

## 一、关于人格假设与基本分析方法

马克思对人格的假设是牢固地奠定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人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一方面,作为客体的人,马克思认为是现实的社会的与历史的。首先他指出,应“从地上升到天上”理解“从事实际活动的人”<sup>①</sup>,而不能从虚构的人出发去理解人,这说明人是现实的人;其次,他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②</sup>,并认为,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

系是物质利益关系,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因此,人总是一定利益集团的人,一定阶级的人,而不是离群索居的人;社会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因此,人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必然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另一方面,作为辩证历史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在指出人的客体性的同时,又指出人的主体性,即人是一个有机的活跃的、始终充满革命性的主体的人。作为主体的人,既是历史的有目的创造者,又是社会历史的推动者。人的主体性,包含在社会基本矛盾的历史运动中,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显然不能脱离人的运动,而是直接表现为人的运动,在阶级社会中,表现为一定阶级的人的运动。在此人格假设基础上,马克思分析制度变迁采用的带有特征意义的分析方法有:

1、唯物历史分析法。马克思从世界范围的公社所有制的开拓性研究到对西欧的奴隶制、封建制的瓦解剖析,从封建制瓦解到资本所有

制的分析,从资本主义微观企业制度的演进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局限性的揭明,都浸透了唯物历史分析法。2、唯物历史辩证法。马克思在指出历史辩证法是“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的同时,进而又把历史辩证法奠定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创立了唯物历史辩证法,并运用它分析社会形态的变迁。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运用唯物历史辩证法,分析了西欧的历史进程表现为五种所有制的演进,继而从印度社会开始,研究了原始社会公社所有制问题。在研究过程中,提出了三大形态划分的论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社会形态理论。3、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系统动态分析法。社会经济是一个非平衡的开放系统。马克思对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开创性地灵活运用了系统动态分析。例如马克思运用矛盾系统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有历史局限性的动态非均衡系统。他的分析循着商品内在矛盾即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生产的进一步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充分展开,导致了经济波动与周期性的危机,并决定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又如,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经济演变一般规律的表述:“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sup>④</sup>这里,表现为典型的系统结构分析。

诺斯在人格假设上,一方面,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以个人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经济人”假设表示不满,力求超越其局限。力求融进一些历史唯物主义因素,拓宽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的

假设。但是,另一方面,他没有从根本上超越经济人假设,而且在他的整个经济理论中,充满了经济人的气息。其制度变迁理论,也是构造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首先,经济人是他的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他对制度变迁分析的逻辑起点就是经济人的成本——收益分析。其次,他对制度变迁的具体考察,包括制度变迁的动力、条件与过程、制度变迁主体的动机、制度变迁的效率评价等都是建立在经济人的分析基础之上。最后,在诺斯的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整个“制度变迁理论”中,处处充满了“经济人”的气息。

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诺斯对制度的分析法,一方面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法表示不满,而认同了马克思方法论的科学性。诺斯认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有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sup>⑤</sup>。诺斯在分析制度变迁中,也吸收了马克思的分析法,如理论与历史的统一,历史的非均衡系统动态分析。不过,必须强调,诺斯的历史分析法是建立在经济人的理性分析基础之上,又侧重于历史归纳法,而他的系统动态结构分析法夸大了国家与意识的作用,颠倒了存在与意识的关系,而是以历史唯心主义为哲学基础。

另一方面,以诺斯为主要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为主流经济予以承认甚至尊重,是因为其方法与研究主题都与正统经济学接近或比较一致。诺斯对正统经济学方法的接受,突出地表现在对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证伪主义科学哲学方法的承认与强调上,并以之为基础,认为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收益分析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事实上,这一“标准经济学方法”是诺斯分析制度变迁的核心方法。他以此为中心,具体展开为新古典经济学惯用的均衡分析与边际分析,形成了带有诺斯特征并与马克思经济学泾渭分明的方法特色。通阅诺斯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力作《经济

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我们可以看出，他处处是在运用均衡、边际分析法来分析制度变迁。他不仅对制度供给、制度需求、制度均衡与非均衡等有专门的定义与分析，而且认为制度变迁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制度变迁是从不同制度的边际处开始，并且是一个边际的渐进过程<sup>⑤</sup>。可见，诺斯与马克思在制度变迁分析方法上，虽有相似之处，但在根本上是各具特色的。

## 二、关于制度变迁的主体

马克思认为社会变迁的主体在于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因和革命性的内在根据的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下的人。由于马克思认为不同利益集团与阶级关系下的人对制度变迁的反应、要求与表现是不同的，并且他认为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引致了社会制度的变革，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制度变迁的主体，必然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利益集团或阶级，即是人民群众。对此，他从微观到宏观，都作了丰富的论述。

在微观上，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经历了协作企业——工场手工业企业——机器化下的工厂制——股份公司之变迁。诚然，这一变迁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内在驱使与市场竞争外在压力相结合的产物，表面看来，是资本家为了最大化地生产与实现剩余价值而推动的制度变迁，因而资本家成了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变迁的主体。但是，从深层考察，可以发现，剩余价值规律的实现与展开是以技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因此，是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推动了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变迁，对此马克思作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考察，这反应在他对不同历史时期企业性质的命名上。那么，谁是技术进步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承担者，显然，马克思认为是从事社会实践特别是生产实践活动的人民群众即是工

人阶级。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变迁的主体。进一步就资本主义企业的具体管理法规与制度的变迁而言，实质上也是工人阶级成了这些制度变迁的主体。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工作日》与《机器与大工业》两章中作了详尽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工作日长短的界定，对劳动时间强制的法律以及工厂法的建立与修改等，与其说是资本家确立的不如说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正常工作日的确立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长期的多少隐蔽的内战的产物”<sup>⑥</sup>。

从宏观上讲，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的主体，而无产阶级是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主体。他认为，一方面，资产阶级在封建的外壳中，发展了为封建的所有制所容纳不下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另一方面，在资本制度确立与上升时期，资产阶级“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sup>⑦</sup>，这说明，资产阶级创立的资本制度比封建制度能潜伏更大的生产力的发展，更具有历史绩效，因而资本制度取代封建制度则成为历史的必然。然而，当社会生产力强大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使整个资产阶级因“生产过剩的瘟疫”而陷于混乱时，“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sup>⑧</sup>，代表生产力发展的无产阶级将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埋葬者。因此，马克思认为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阶级是社会制度变迁与更替的历史主体与推动者。

诺斯基于个人主义下的经济人假设，吸收熊彼特的企业家创新理论，认为“广义企业家”是制度变迁的主体。他认为，在稀缺经济下的竞争导致企业家和组织加紧学习以求生存，在学习过程中，发现潜在利润，创新现有制度<sup>⑨</sup>。这里诺斯所说的组织既包括经济组织也包括政治组织。在诺斯看来，政治组织就是政治性企

业,政治家也是企业家。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有个人、团体、和政府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制度变迁的主体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特别要提的是,诺斯把政府也等同于其他主体,将政府在制度变迁方式、动力、组织实施方面的复杂性、差异性高度简化为企业家的经济行为。

诺斯在分析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将制度变迁主体分成“两级行动团体”即“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创新第一步是由“初级行动团体”进行,而“任何一个初级行动团体的成员至少是一个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sup>⑩</sup>,因此,首先从事制度创新的是能预见潜在利润存在的企业家。“次级行动团体”是用于帮助初级行动团体获取收入而进行制度变迁的团体<sup>⑪</sup>。但是,它也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参与变迁的,不过其追求利润目标的实现是通过迂回的收入再分配方式来实现。因此,应是一个“准企业家”团体。所以,“两级划分”没有与“把不同主体归一为企业家”相矛盾,两级主体都是诺思定义内的“企业家”。

### 三、关于制度变迁的动因与条件

马克思认为任何社会经济制度都有一个产生与发展过程,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它必然要消亡。他对经济制度变迁的动因与条件作了天才的分析。例如,他在《费尔巴哈》论著中,下联生产力,上联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与意识上层建筑),系统地分析了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制度的变迁。这一分析用数学函数关系可表示为: $I=f(Q,P,T)$ ,式中, $I$ 为经济制度, $Q$ 为社会生产力, $P$ 为政治上层建筑, $T$ 为意识上层建筑。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是把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发展视为制度变迁的第一推动力。马克思本人也始终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因。当生产力发展了经济制度就要作出相应的变化。马克思说:“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的分工的发展程度上”<sup>⑫</sup>,”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

是所有制的不同形式”<sup>⑬</sup>。在此理论基础上,马克思分析部落(stamm)所有制到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到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的变化过程。后来在批判普鲁东的过程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马克思在致巴·瓦·安年可夫的信中写道:“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与消费的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sup>⑭</sup>

在指出生力力是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后,马克思强调经济制度的产生与灭亡,都有其客观条件,这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结论性命题,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sup>⑮</sup>马克思的这个结论是建立在大量的具体分析基础之上的。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随着生产力发展,劳动资料与劳动的外部条件出现私人占有,这样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自由私有化的私有制排斥协作与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14至16世纪,由于各种大发现,造成了生产的日益社会化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因而小私有制内在的不适应生产力的大发展,在“最残酷无情”的各种野蛮手段的催化下,产生了资本占有制。在资本主义确立与发展时期,协作日益发展,科技自觉运用,劳动资料社会化结合使用,创造了超历史的魔术般的生产力,结果,一极财富的积累形成了资本垄断,一极工人贫困的积累导致了生产力萎缩,历史发展的结果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sup>⑯</sup>

作为系统结构分析,马克思除分析了制度变迁的客观条件之外,还分析了包括阶级、政党、国家、意识等在内的主观条件(或因素)。马

克思认为,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为此,他很注重分析各阶级的利益矛盾和力量对比对制度变迁的作用。他认为无产阶级队伍的形成与壮大,是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一个先决性主观条件。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不仅增强了摧毁资本制度的阶级基础,而且改变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在无产阶级发展过程中,马克思特别强调组织政党尤其是共产党的重要性,因为共产党人在实践方面,是各国工人政党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在马克思看来,国家的实质在于它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所以,国家在制度变迁中,一方面维持现有统治者的法律、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制订修改某些非根本制度以进一步强化现有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促使国家供给新的有关制度。最后,马克思还充分认识到社会意识对制度创新的作用。作为科技形态的意识,马克思视之为生产力。资本有机构成理论正是说明技术的变化导致资本制度的矛盾与运动。作为法权形态的意识,马克思很重视无产者利用议会、法权来与资产者作斗争。对于革命理论,他认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会变成物质力量”。<sup>①</sup>

必须强调,马克思强调阶级、政党、国家意识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是仅局限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范围之内。没有把它们视为制度变迁的最终决定因素。

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就是关于制度变迁的动力与条件的分析。他认为,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是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即“外部利润”。“正是获利能力无法在现存的安排结构内实现,才导致了新的制度安排的形成”<sup>②</sup>。为什么会产生外部利润,他分析是因为有许多

外部性变化,包括(1)规模经济的变化;(2)外部成本与收益的变化;(3)对风险的厌恶;(4)市场失败与不完善。这些外部因素的变化成了诱致人们去努力改变制度安排的收益来源。<sup>③</sup>

关于制度变迁的条件,诺斯认为潜在利润的形成是导致制度变迁的客观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他指出,现有制度均衡不能够永久地保持,是因为某些因素的发生往往导致成本与收益的变化,导致潜在利润的产生,从而形成制度创新的诱致。至于充分条件,他认为是制度创新可能获取的潜在利润大于为获取利润而支付的成本。“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只有当这一条件得到满足时,我们才可能发现在一个社会内改变现有制度和产权结构的企图”<sup>④</sup>那么是哪些因素会导致收益与成本的变化以及潜在利润的产生,诺斯认为有三大因素:1、对制度创新的需求作过很大贡献的因素,包括市场规模的变化,技术创新,制度创新者的收入预期的改变。2、某些涉及制度安排创新与操作成本的因素,如组织费用的外部负担,技术革新,知识积累,教育体制发展,政府权力的集中与社会影响。3、导致制度从均衡向不均衡变化的外生性变化因素,如政府规模、构成或规则的变化,公众行为规范和社会的价值标准的改变。<sup>⑤</sup>

诺斯也认为,要实现制度变迁,应具备一些主观条件,如作为变迁主体的形成,主要是第一、第二行动团体的形成。诺斯还特别强调国家与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他认为国家的主要功能是界定与实施产权,因此,国家决定产权结构。他说,一个国家的政体决定着、指导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这也就是说除非我们制造出一个稳定的对高效率的经济制度起支持作用的政治制度,否则我们就决不可能建立起稳定的有效率的经

制度变迁中主要有列作用:(1)它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2)它确立现行制度符合义理或起凝聚团体的功能;(3)协调人们的经验与他的意识形态不一致。

必须指出,诺斯在强调国家和意识在制度变迁的作用时,颠倒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因而滑入到历史唯心主义中去,这是与马克思根本不同之处。

#### 四、关于制度变迁的方式、过程与作用

对于制度变迁的方式或途径,马克思受唯物历史辩证法支配,认为制度变迁是量变与质变,渐进与革命的统一。一般是先有微观非根本制度的变化,等渐进式变迁在量上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才会发生社会革命,进行所有制与国家制度的质的革命性变迁。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变迁的分析,先是具体地分析资本主义微观企业制度的三个阶段的渐进性变迁,然后对股份制的过渡性进行分析,把渐进性变迁引入根本性制度的变迁,认为股份制是扬弃私有制,实现公有制的过渡形式,当微观制度变迁的量变与部分质变到了一定阶段,无产阶级也壮大成熟了,这时,马克思主张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通过暴力)来促进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变迁。对于制度变迁的过程马克思认为,某一社会经济制度变迁,首先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这一矛盾在现实上表现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革命阶级与维持旧的生产关系的统治阶级的“利益磨擦”与斗争;其次,随着矛盾的展开,革命阶级则不断壮大,并产生了革命阶级的政党,该政党唤起革命阶级的主体意识;再次,革命阶级先是在经济领域与统治阶级进行斗争,随着斗争的深入与社会革命主观条件的成熟,主要运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最后在变革与摧毁旧的统治者的经济基础之上,进一步完成社会制度的变迁。至于制度变迁的作用,马克思一方面充分肯定了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变迁会促进技术进步,带来

经济效率的提高,从而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并在此基础上,会带来更大的社会公平。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制度变迁是由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所决定的,前者是因变量,后者是自变量,为此,制度变迁对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作用仅局限于“反作用”范围之内,而且这种反作用有促进与促退二种形式。虽然是以促进为主流,但也不能否定不合理制度变迁会牺牲效率,阻碍经济增长与发展。

诺斯由于在心灵深处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可以通过改良而永恒地存在,所以他认为制度创新是以渐进式为主,革命式变迁不会也不可能发生。尽管他分析具体问题时,作了“渐进式”变迁与“革命式”变迁的划分以及与之相应的“连续性变迁”与“非连续性变迁”的划分<sup>⑧</sup>,但他反复强调制度变迁“很少是完全非连续性的,制度变迁一般是渐进式的”<sup>⑨</sup>。总之,他把制度变迁的路径描绘成一条从边际部分开始,只有量变没有质变的平稳的渐进的连续的和諧之道。

对于制度变迁的过程诺斯认为一般经历五个步骤:(1)形成能发现制度变迁潜在利润的并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2)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方案;(3)对方案进行评估与选择;(4)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5)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实现制度变迁。诺斯还指出,经过上述步骤,使制度出现均衡,但由于外在因素变化,制度又会出现非均衡,为此又要进行创新。所以,制度变迁是一个从制度均衡到制度非均衡再到均衡的反复过程。至于制度变迁的作用,诺斯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变迁而不是技术变迁,而且他认为制度变迁是收益大于成本下的理性行为,因此制度变迁一般会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不仅如此,他强调制度变迁应内生到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去,并视之为关键变量。他还以历史上的两次经济革命为例说明,与其说是技术创新

导致了经济效率革命,不如说是制度创新导致了技术进步进而导致了经济效率的革命。<sup>③</sup>

### 五、对我国改革的几点启示

1、改革仅是利益调整,还是实现社会全面发展。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尽管经济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核心,但毕竟不是全部内容。为此,马克思主义者的改革观应是系统改革观,即应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点,以利益关系调整为杠杆,以上层建筑完善为辅助,实现社会与经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全面推进。在改革过程中,既要算经济帐,也要算政治帐;既要考虑局部经济利益,更要考虑全局综合社会效益。以经济为中心但不以经济为“森林”。如果改革仅是追求经济利益,则会陷入“唯经济主义”。目前,社会上出现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道德滑坡、风气不纯等问题,某种程度上,是“唯经济主义”改革观所带来的一些问题。

2、改革的主体是企业家还是人民群众。有一种改革观认为,改革的关键在于生成企业家,改革的加速与成败主要在于“智能集团”的生成壮大。这显然是诺斯的制度变迁主体观的翻版。诚然,企业家在改革过程中,是起宣传、组织、领头的重要作用,因此,改革的推进需要形成一支强有力的企业家队伍,这如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一样。但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观点,也是马克思制度变迁的主体观。企业家应以人民群众为基础,改革应倾听人民的呼声,顺应人民的要求。改革程序应从下而上,从实践到理论,从人民群众到企业家。农村制度变迁的成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某些仅以少数人的驱利为目标的所谓“精英企业家”的改革方案,导致了社会不公平与混乱,说明改革不能以企业家为主体。目前,国有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晰,企业法人代理约束规则不健全,如果过分推崇企业主体改革观,强化企业家“生杀予夺”之权,结果可能会导致国有企业

中的企业家在个人驱利和施权上是资本家,但在责任上却不是资本家的机会主义行为,并强化物权统治人权的异化劳动。改革过程中,职工群众与厂长经理的分离对待,职工群众劳动积极性的进一步下降,在某种意义上是唯企业家是改革主体观所带来的问题。因此,社会主义改革,必须树立人民群众主体改革观,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民主化、法制化应成为我国改革的重要战略。

3、改革的逻辑起点与动力是利益比较还是发展生产力。有一种改革观,改革就是利益调整与再分配,改革的逻辑起点与动力所在在于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改革的关键是制度(尤其是产权)调整。诚然改革是一个利益调整过程,即打破旧的不合理利益格局,重建具有动力与约束效应的利益格局。但是我们不能把改革思维仅局限于利益关系的调整,缩小改革视野。从整个社会经济大系统看,生产力发展是这个系统的逻辑起点与动力,这是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的动力观。为此,改革应重在发展生产力上,改革的依据、动力、目的、归宿都应围绕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如果把改革焦点凝聚在利益比较上,且不说它会陷入“唯经济主义”,仅就利益比较而言,由于改革的成本与收益是一个灰色甚至是一个黑色系统,在现实上是很难操作的,如果把精力耗费在利益比较上,可能不仅会延误改革机会,而且会扩大利益摩擦与矛盾,降低劳动积极性,牺牲经济效率。例如,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产权改革可谓是“云来雨去”,承包、资产经营、利润分成、股份改造等翻云覆雨,使劳动者不知所措。结果还是企业活力不足。因此我们应从传统的改革思维中走出来,端正生产与分配的关系,把改革的着眼点放在提高劳动者素质上,加快科技进步转化,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与规则等,由此生长出新的生产力成分,从而发展生产力,在此基础上,调整利益格局,推进改革顺利进行。

4、改革的方式是渐进还是突变。多数人认为,我国改革应选择渐进式改革,但有一些人认为不能仅局限于渐进式改革,还应有突变式改革。笔者认为,在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换过程中,伴随着人们的利益摩擦与一定程度的社会震荡,为此,我们应处理好改革、稳定与发展的关系,尽量选择振幅小的渐进式改革,但是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量变与质变的统一是任何事物发展的必然轨迹,诚然渐进式改革有许多优点,但它有时会造成改革的时滞,延长旧体制的作用时间,造成社会经济的许多不协调问题,并且,如果我们选择的某种改革方案开始就偏离了改革的正确轨道与改革目标,则渐进式改革会形成一条 lock-in 改革路径,为以后改革形成不良的路径依赖。所以正确的改革观应是以渐进为主,但不能忽视突变改革,改革量变到一定程度,应抓住机遇,促成质变。

5、改革是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一种改革观认为,改革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与关键所在。诚然,改革是推动生产力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一种动力,马克思也承认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变迁将会刺激经济增长。但是,我们知道,经济增长是生产力范畴,因此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在于生产力系统内部而不在于制度系统。制度是生产力系统中的一个外生变量,所以,制度变迁或改革只能通过生产力系统这一内在根据发生反作用,而且这种反作用有促进与促退两种形式。如果把改革视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则是一种诺斯制度变迁作用观。因此在处理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一方面,在体制创新过程中,集中一些人力、物力、财力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是必要的,因为从长远看,这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另一方面,不可以放弃经济发展的目标,使改革脱离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否则只能是本末倒置欲速而不达。因此,必须因地制宜,审时度势,使改革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步入良性循环。

#### 注释:

①、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0、18页。

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82页。

④. 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68页。

⑤. 参阅: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第93—115页。

⑥.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31页。

⑦、⑧.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56、257页。

⑨. 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纲要》,《改革》,1995年第3期。

⑩、⑪. R·科斯、A·阿尔钦、D·诺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272页。

⑫、⑬.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5页。

⑭.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20—321页。

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83页。

⑯.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831—832页。

⑰.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9页。

⑱、⑲、⑳、㉑. R·科斯、A·阿尔钦、D·诺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296页;参见:第277—290页;第274页;参见:第298—302页。

㉒. 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纲要》,《改革》,1995年第3期。

㉓. 道格拉斯·C·诺斯:《交易成本制度和经济史》,《经济译文》,1994年第4期。

#### 主要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序言》,《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

诺斯:《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制度变迁理论纲要》,

R·科斯、A·阿尔钦、D·诺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作者周小亮:福州大学管理学院管理系讲师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生